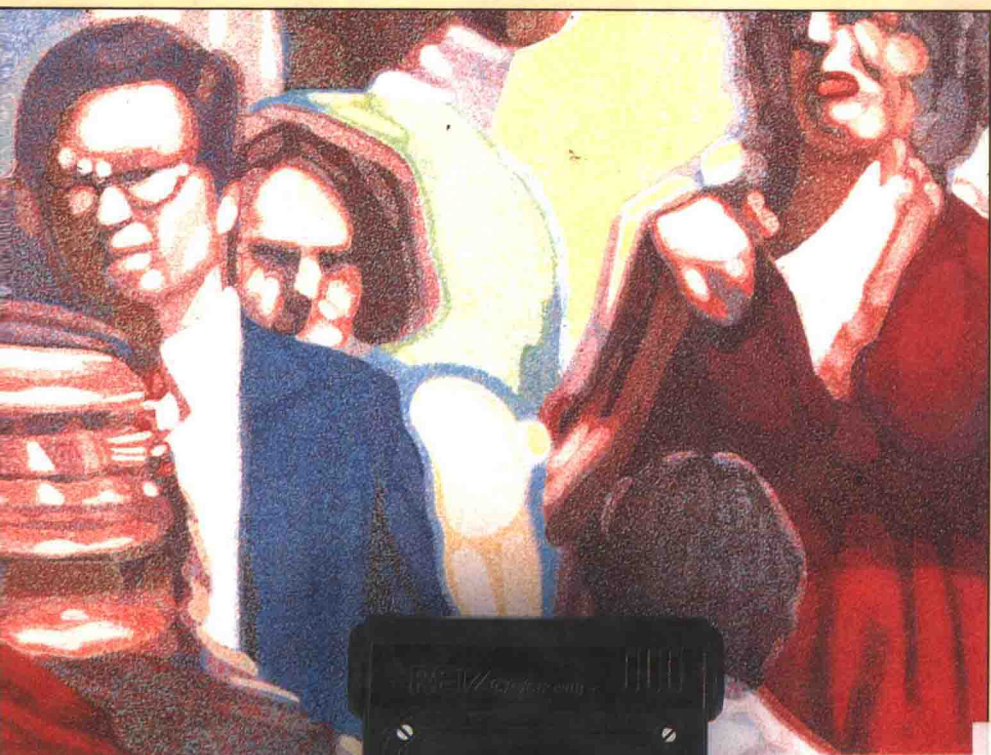


聯合月刊 叢書②

中國何處去？

錢穆・余英時・許倬雲 等著



聯合月刊叢書②

中國何處去？

聯合月刊叢書②——

中國何處去？

著者 錢穆、余英時、許倬雲等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月刊雜誌社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撥：〇五一〇〇〇〇一三

電話：七六八〇〇九一

總經銷 聯經出版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七樓

電話：七六二七四二九

印刷行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正路八〇〇號

電話：二二一七四一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二八三二號

定價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正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二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時序進入中華民國七十五年深秋，正當海內外中國人熱烈慶祝十月慶典和紀念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之際，復興基地台灣正在進行一連串空前的革新。這些革新，不論是政治的或經濟的，都會對台灣未來的生存和發展，產生極深遠的影響；尤其政治上的變革，更是引起全世界矚目。

這一連串的變革雖然是最近才發動的，但是引發的潛在因素卻存在已久，建議變革的呼聲早已有人提出；「聯合月刊」創刊五年以來，環繞著相關問題的討論也從未間斷過。回顧專家學者在「聯合月刊」發表的大作，他們對國是的檢討和思索，不但沒有過時，現在重新閱讀，更覺得有前瞻性的深刻意義。

執政黨正在研究開放成立新政黨的問題，並且宣示，將來的新政黨必須尊重中華民國憲法，必須反共，必須與「台獨」劃分界線。這不但是執政黨對組黨問題的政策，更是執政黨對「中國

何處去」這個問題的基本答案。可惜籌組中的「民主進步黨」，對這個問題卻沒有相對的明確呼應，使「中國何處去」的探索，在此時此刻，成為更重要、更迫切的課題。

「中國何處去？」這本書，收集了二十三篇文章，除了許倬雲先生大作原載「聯合報」之外，其餘都發表在「聯合月刊」上。全書分作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學者專家的論著，第二部份是國是座談會的紀錄。

——聯合月刊編輯部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目錄

第一部份

鬆了好辦，緊了難解／許偉雲

新春看時局／錢穆

中共又施舊花招／聯合月刊編輯部

虎年說「風」／余英時

台灣未來十年的政治前途

實施憲政規則・長保政治安定／江炳倫

基本國策、國共競賽與國家前途／邵玉銘

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呂亞力

刻骨銘心一夕談／李靈均

正當作用與政黨作用／張作錦

鬱悶焦燥的這一年？／瞿海源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釋義／謝延庚

經革會的來龍去脈與評價／侯家駒

第二部份

開擴憲政體制運作・加速政治人才培養

以大氣魄、大決斷開創新局

經濟升段非「變法」不可

先做一兩件大快人心的事

傳播學者談政治溝通

文化、教育與傳播媒體

中國何處去？

「法」要高於「政治權威」／葛永光

黨外必須表明反共及反台獨立場／蘇起

理想中國十要件／葉陽明

信心源自法的確立與執行／葉潛昭

最好的防衛是進攻／薄慶玖

正確而真實的認識敵情／彭錦鵬

鬆了好辦，緊了難解

對國內當前政局的一些觀察與建言

許倬雲

最近台灣有無黨籍人士為了設立公政分會的許多起伏與演變，美國有一群人發起建立委員會事件。還有醞釀在五月十九日舉行綠色運動的傳說，裡裡外外、風風雨雨造成了近年來罕見的緊張情勢，前幾天，美國眾議員索拉茲在眾院小組委員會公聽裡，更是明白提出菲律賓的前例，整個的情勢，呈現更複雜的面貌。

一個多月以前，我曾參加了一次在芝加哥舉行的「大型座談會」，出席者三方四面各有意見，聽眾的反應也從多種多樣的「角度」，各自表現他們的愛和惡，

這次座談會反映的情況，也無寧是大局面的縮影，從那次會議上反映的情況看來，我自己感覺，各種意見都參雜強烈的情緒在內。過份的情緒會失去衡量是非的能力，也會因衝動而混淆，甚至於不顧一切後果，只求達成一己的目的。如果最近的緊張情勢也影響到一般人的情緒，其後果就不堪言之。

我們先說台灣的局面是不是和菲律賓一樣，菲律賓的政治始終沒走上軌道，從獨立以來，官貪吏汗經濟萎縮民不聊生，成為第三世界排名的中下者，對大多數的菲律賓老百姓而言，再亂，他們也損失

不了什麼，菲律賓雖然內部很分散，人民的實力究竟在草寇階段，外面也沒有任何其他政治單位在旁虎視眈眈，菲律賓這次由示威而至兵變，美國多少有點份，而美國有兩大基地強大兵力在旁監視，即使變，也有能放能收的把握，不至於一發而不可收拾，這些情形，都是菲律賓獨有的狀況，與台灣迥然不同。

台灣一般的民生，尚稱安樂，固然百尺竿頭還可更進一步，一般人的生活，在近十年來都有顯著改善，而往下走，也還可期待更多的進步，如果台灣是魚爛的局面，三十多年培養的一些薄薄基業，都將付諸東流。另一方面，海峽對岸虎視鷹睨，如有可以白撿的便宜，絕不會放棄機會，譬如鄧小平的公開談話，胡耀邦對記者發表的意見，都口口聲聲絕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芝加哥年會上，中共派來的代表，也再三強調，大陸對台灣有用武的權利與可能。總合這幾年來中共的態度，大陸會

用武的情形約有二種，一是台灣宣告獨立，二是台灣內部有變亂，因此台灣若因緊張情勢而有衝突，甚至於不經意的小衝突，萬一因為互不相忍，而變成武打，大陸上絕不放棄動武的機會，那時候，所謂「一國兩制」也不必談了。可以預料的情形，大陸來台的人士，勢將遣送回原籍，聽候審判，本省籍的精英份子，也會分散到大陸各處，甚至上山下海充實邊疆。但是，「解放」後的台灣，勢必喪失了開展的活力，對大陸而言，也未必會是真的收穫。因此，台灣的任何小衝突，萬一引發上述的變化，是一個人人通輪沒有贏家的局面，空洞的統一，對中國、對台灣，也都無具體益處。

從歷史上的許多事件看來，導火線往往來自未曾預料的方向，導火線只能點燃大火，不是由於導火線本身的作用，騰天的火焰主要是由於緊張的情勢，先蓄集了一觸即發的爆炸性，中國成語曲突徙薪，是唯一可以預防災難的途徑，等到烈火燒天，

即使焦頭爛額也已經太晚了！

再說各種革命在人類歷史上的評價，也是負數多於正數。法國大革命摧毀法國原有社會基礎，多少有用人才在恐怖期間死亡，一個理想主義革命運動反而為拿破崙的帝制開了路，法國雖然然是民主革命的創始，到今天，法式民主還不如英式有效合理，法國一般人民對民主的信念，到今天，還是在依違之間，政治仍舊不安定，這可算是幾起幾伏大變化後的遺毒。美國的獨立戰爭，基本上是兩個政治單位之間的戰爭，並不是社會革命，所以不可與法國大革命同日而語，俄國的革命，造成今天空前的專制與獨裁，到今天，俄國人民過的日子還談不上好，中國革命的慘痛歷史，都在我們自己的經驗中，也就不必敘述了。

反之，英國的政治改革是靠妥協與溝通，固然中間也有過國王上斷頭台的事，在整個英國的政治歷史改革上，只能算片段的插曲。北歐與瑞士、比

利時等的政治演變，也都由點點滴滴的改革做到今天，民豐物富安居樂業，人權不受壓制的美好境界。索拉茲的作風代表美國對民主制度本身的信念，也代表了六十年代極為高張的「傳道」精神，我從不懷疑索拉茲本身對民主信念的真誠，也不懷疑他要別的國家也能建設民主社會的誠心，但是這種「傳道者」，熱心有餘，對當地情況認識不足，只想拆了房子再蓋，萬一蓋不起來，他攤攤手聳聳肩也就算了，當此是一個失敗的經驗，他還是做他的議員。從住房子自己的人角度來看，房子修修改改，可以常常改善居住條件而不會有一天要露宿街頭，革命與改革，一個求痛快，一個講實效，從當事人的角度看，大概實效更為重要。

我願籲請台灣各方面，都能冷靜理智，執政黨多年以來，抱定了不許新設政黨的主張，現在也應該靜下心來想想，開放黨禁究竟是不是真會導致社會的不安，還是加強黨禁會造成社會的緊張，執政

黨蔣主席最近提出多多溝通的主張，日前執政黨與無黨籍人士也進行了一次頗為成功的溝通，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希望受命溝通的人，多多虛心地瞭解無黨籍政治人士的立場，及民眾的想法，更希望黨政方面的負責安全的人，不要以對立做為假設，更不要以壓制做為手段，無黨籍政治團體的領袖，說實話彼此意見也未必一致，有時候，大家因為被一句話架住了，誰也不敢提出別的意見，我希望無黨籍政治團體的領袖們，愛護家鄉已經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建設，不要因為小不忍而亂大謀，台灣的魚爛是台灣每一個政治領袖都應努力防止其發生的惡夢，海外的台獨份子對許多問題的意見，並不真正與國內無黨籍人士完全一致的，我希望執政黨與政府不

要拿無黨籍政治人士與台獨劃上等號，徒然把問題攪得更複雜更難解決。我更希望，不直接參加政治的全國國民及各界領袖，在危疑震撼之際，不僅不要隨波逐流，不要推波助瀾，還需要正面的擔當起協調溝通以及籲請大家以理性相待。

台灣的政治，有許多目前還解不開的結，解結要有耐性，解結也需要鬆動，我們每個人都有解結的經驗，扯得愈緊愈解不開，最近有一位教太極拳的朋友，在舍間示範，他特別指出，放鬆身體才站得穩，繃緊了一推就倒，此雖拳藝可以喻大，天下事都是鬆了好辦緊了難解。

（原載七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聯合報）

新春看時局

錢 穆

—

你所提的問題，牽涉太廣。你要我寫一篇文章，千頭萬緒，不知從那裡寫起，還是隨意談談的好。

我可以說，我一輩子寫書寫文章，大體內容，主要不外乎三項原則。一是文化傳統，二是國民性，亦即是民族性，三是歷史實證。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國歷史來看，歷史就是——最好證明。

中國歷史五千年，早已完成了一個和平的統一的民族國家，日廣日大，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有此成績。我平生所講各方面的問題，都是注重在這一點上。這亦即是我上述的撰文內容。

前幾天，我內人為我唸了「漢學研究通訊」上一篇學人專訪。那是一位大學教授訪問法國女漢學家巴斯蒂教授的記錄。巴斯蒂女士特別舉出一點，她說，中國國家的完整以及持久的統一性，特別吸引她。這一點很令我欣賞。巴斯蒂女士也提到中法兩國文化傳統政治環境完全不同。換言之，亦即是

中西的不同，即是中國與歐洲的不同。法國只能在歐洲中建立一個國家，絕不能把歐洲統一起來建成為一法國。法國人從無此想法，歐洲其他國家亦無此想法，這就是歐洲人的文化傳統使然。從希臘開始，就是這樣。整個歐洲沒有完成過一個國家。他們的國家發展，便會趨向於他們所謂的帝國。帝國是由這個國家征服另一國家，纔稱帝國。中國則從來沒有走向帝國主義的路線，從不以侵略國外為務。歷史上朝代的更迭，這是國內政府改組，不能說這是中國人征服中國人。我們今天如果隨便稱秦帝國漢帝國，這是不通的。中國從來不是帝國主義。

孟子說「天下定於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是中國人觀念。西方人沒有天下定於一的觀念。倘使說他們最近亦有此觀念，他們似乎認為能多殺人纔能一天下。所以形成了今天這樣的局面，美蘇爭霸，核武競爭，星際爭霸，世界永無安寧。這顯見中國西方雙方文化觀念大不同。西方

人根本沒有中國所謂的「和平觀」。今天講來，中國人這個傳統文化中的和平觀，成為不合時宜，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常要自稱是落後的國家，落後的民族。西方人所沒有的，我們都不看重了，早沒有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至於西方人能不能統一全世界，能不能領導世界臻於和平，這是將來世界一個大問題。對日抗戰時，我在成都，當時昆明西南聯大諸教授出一雜誌名「戰國策」。他們認為當前的世界，等於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中國下面有秦國統一天下，他們以為大戰後，世界亦會統一，非美即蘇，如秦或齊。我當時說，當前大戰和戰國時代不相同。我對當時的二次世界大戰特地替它提了一個名稱，稱它為「解放的戰爭」。我認為二次大戰後，歐洲少數強國不可能再統治其他弱小，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能從帝國統治下逐漸站起來。今天的聯合國，已有了一百五十以上的會員國，這不是證明我的話了嗎？然

而世界雖解放了，但不幸解放得不夠。或者可說，不幸這個世界不能解放，因為被解放的國家民族，都盡量羨慕西方人，因此解放後的世界，國內國際問題變得更多更複雜，亦更難解決了。

我平常講話分兩方面，一是原則方面，一是具體方面。我說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應趨向解放，這是原則問題。今天如印度等世界各民族都被解放了，事變日增，這是具體問題。你問我今年世界局勢的發展，這亦是一個具體問題。今天世界情勢的發展，並不合乎原則，這又是一具體問題。所謂合乎原則，應有一人類共同和平相處的大道理可資依循，而當前具體的演變，則常被許多現實的利害因素所牽扯，變得遠離原則，不可盡知。

比較上說，中國傳統是看重原則性的，西方傳統是看重具體性的。所以中國人講歷史，注意遠古以往的既成經驗，以古鑒今，大體是可信可預知的。西方人不重過去的歷史，看重眼前與將來，更具體，

反不易知。如當前之美蘇爭霸，中東糾紛，又誰能確知其具體的變化呢？但就中國人觀點言，則可確知，核子武器恐怖手段，可以毀滅全世界全人類，但決不能主宰全世界，統一全世界。換言之，依照西方傳統，個人主義，唯物史觀，經濟政策，驢武方略，決不會給人類帶來和平，帶來幸福，這是絕對可信可預知的。

一一

你問我看今年國運如何？這又是一個具體問題，難以盡知。我還是從原則方面來談，比較確切些。

從原則方面看，台灣將來的情勢發展應該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對內求安定，一方面是對外求生存。今天台灣許多學者專家，以及政府要員們，太偏重在科技與經濟兩項上。就當前具體的現實言，提高科技水準，追求經濟繁榮，自然有它的貢獻。

我是講原則的，我講將來亦喜歡根據歷史經驗，所以我認為只重科技與經濟，絕對解決不了此下台灣的困難。因為科技與經濟兩項，這是新事項新手段，意義價值都有限。不是完全能依照我們的期望，日

日有進步，年年可成長。而且它受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隨時可有變，不是我們能把捉得住的。我認為為國家內部的安定與否，主要條件，完全在社會人心。歸根結柢一句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前途，主要依賴在全民合理想合原則的自尊自信上。除此之外，別無他途。至於如何培養人民合理想合原則的自尊自信，這就牽涉到整個國家的教育問題上去。關於這一方面，不是簡單幾句話能說得盡。但我可以簡單指出一點，我認為今天台灣整個教育的發展，已遠遠遠離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教育不重教人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而只看重發展個人的知識技能。今天我們的教育，或可培養出有各種技能的人，而培養不出真正愛國家愛民族，在家能為賢子

弟，出到社會能為一奉公守法的好國民。這是一危險的現象，政府不能不早注意。教育問題說來話長，我暫不在此多談。

講到對外求生存，我們今天對外的主要對象就是在對付大陸中共。我認為此下的中國，只有全中國和平統一始是個大前途大希望。說是台灣獨立，或大陸與中華民國永遠對立，這在原則上講，是非理想且不可能的。但我所說的和平統一，並不是就當前現實的政治情勢謀求妥協而言。我是研究歷史的，我更看重歷史的傳統文化精神，我所說的「和平統一」，是根據我一生鑽研歷史對傳統文化精神的瞭解言，這是我們的民族性。將來的中國，不論由誰一政府來領導，我認為如果此一政府違背了歷史傳統文化的民族性，恐怕都難以成功。這是個原則，應是可信又可預知的。

今天在台灣，一提到「和平統一」四字，就易招人誤解，認為你不是為中共作宣傳，就是被中共

統戰去了。大家口口聲聲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沒有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詳細內容具體方案舉出來。我認為中國五千年來，傳統相承所建立的和平統一的民族國家，這是人類所稀有一傑出偉大的貢獻。辛亥革命建號中華民國，是主張自此以後，君主政府將不再出現，故稱民國。在這一國號之下，宜可有相異的政權出現。換言之，在同一國號之下，可有不相同的政權，但不宜因政權不相同，即輕改國號。毛澤東政權第一大錯誤，就在他輕改了國號，把一國輕改成兩國。一切大錯誤主要都由此引起，毛澤東自己生前亦知道，亦說過。

今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名詞上論，與中華民國又有何大不同之處？而且此下的新中國，從歷史論，究應從中華民國開始，還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即此下新中國的創始人，究當屬孫中山？抑屬毛澤東？世事雖亂，人心大同，這一問題可不辯而自定。毛澤東輕改國號，主要原因，乃在

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為甚麼中國不許中國人自作領導，必該由非中國人來作領導呢？這更是毛澤東政權的更大錯誤。

就中國五千年傳統相承言，將來的中國，仍須為一和平統一的民族國家，仍須由中國人自己來作領導主持纔是。這一轉變的開始，首先需要兩項先決條件。一是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不許再存在，而改回中華民國國號，如此則台灣與大陸一切不同的政治意見，都在同一國家之內，即中華民國之內，盡可從長商議。這是同一國家內部的政治問題，不是兩國之間的外交問題。為求達到此目的，則首先須要將馬恩列史的地位與口號，徹底在大陸清除。這兩點先做到，纔能成為和平統一商談的開始。倘使仍是兩個國，仍是中國事須由非中國人來作領導，則和平統一的商談將根本無從下手處。

以上的主張，似乎是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

而言。但如不明白提出此兩主張來答覆大陸所提和平商談之建議，則似乎大陸和台灣乃毫無商談的可能。這恐怕亦容易引起誤解，認為中國前途和平統一乃一不可能之事。此則大遠離了中國傳統文化之理想與原則，似非正道，為智者所不為。

當前的大陸，仍是陷溺於無情無理中，而不能自拔，但這是眼前具體事狀。就中國民族文化前途之大原則大理想而論，則大陸與台灣終必統一，更應是一和平的統一。不能專就眼前事狀，而抹殺其大理想大原則之所在，這是我民族我國人當前最當努力注意一問題。

所以如何來領導和平統一的商談，終不失為積極的一面。拒絕和談恐終是消極的一面。主要在領導如何談，不在談不談。儻領導談而招對方拒絕，這不是失敗，而是其事尚在曲折進行中，與拒不相談、一若絕無其事大不同。

由馬恩列史非中國人來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這

是道地的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絕不能承認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則實由這些人來作決定。所以我們必須首先要求在大陸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此一決定實際上是符合大陸人心的。如果大陸政府不同意，則我們自可拒絕和談。但亦應明白告訴國人，使大陸國人明白我們這番心意，讓他們自作對國家民族前途之抉擇。

具體事狀不可忽，但大理想大原則更為提綱挈領之所在，更不當忽。我們的主要大前提，該是國家民族的出路，並不是黨與黨的爭衡，政府與政府的爭權。

二

你問我大陸近幾年來，在思想原則上已大崩潰了，為甚麼它的政權還能存在？這又是一具體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卻很容易瞭解。大陸人民普遍的窮，